

高市早苗强化日美同盟 亚太安全格局面临新变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婷婷 王梓

近期，日美双方频频释放相互靠拢的信号。早在高市早苗确认当选自民党总裁、尚未正式出任首相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及财政部长贝森特便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对她的表示欢迎与赞赏。美国《新闻周刊》等媒体评论称，高市早苗似乎有意将自己定位为“美国的可靠伙伴”，她的上台标志着日本政坛与美日同盟或将迎来转折点。

10月28日，高市早苗与特朗普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访日，也是其开启第二总统任期后的首次亚洲之行。据日本共同社、日本广播协会及《朝日新闻》等多家日媒报道，双方会谈成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未来数年的美日关系走向。

在此背景下，外界高度关注：高市早苗领导下的新执政联盟是否稳固？此次美元首会晤又将如何影响亚太地区政治格局？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陈洋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作出深入解读。

“阁外合作”模式暗藏政治风险

与小泉进次郎、林芳正等出身政治世家的政客不同，高市早苗出生于奈良，父亲是丰田系企业职员，母亲为警察。尽管单论个人资历或社会声望，她并非最突出人选，但日媒普遍认为，综合能力与政治立场的平衡使她成为当前最优解。

“回顾此前自民党总裁选举可见，高市早苗的胜出，折射出自民党在经历众参

两院选举惨败后，内部逻辑正在发生转变。”陈洋分析指出。

以前任首相石破茂为例，他于2014年当选自民党总裁，主要因其社会知名度高且敢于批评党内弊政，彼时深陷“黑金政治”丑闻的自民党亟需一位“清流型”领袖挽回选情。然而，石破茂执政后暴露出政策执行力不足、缺乏鲜明政治纲领等问题。“他更像一位成熟的政治评论家。”陈洋表示。

相较之下，高市早苗不仅具备较高公众认知度，更以坚定延续“安倍路线”为鲜明标签，契合自民党重振保守派主导地位的战略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10月20日，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正式达成联合执政协议，但合作形式由以往与公明党的“阁内合作”转为“阁外合作”。陈洋用“相对脆弱”形容这一新模式，并指出三大隐患：

其一，互信基础薄弱。“阁内合作”意味着两党深度融合、利益捆绑，而“阁外合作”下两党仍保持相对独立，反映出彼此信任有限。

其二，联盟稳定性差。自民党接受了维新会提出的设立大阪“副首都”、削减约10%国会席位等12项条件，但自民党仍占据主导地位，可能迫使维新会在关键议程上妥协。维新会选择“阁外”形式，正是为保留未来灵活退出的空间。

其三，可规避选举连带风险。2023年年底自民党“黑金政治”丑闻爆发后，与其“阁内合作”的公明党因受牵连导致席位下滑。维新会此举意在避免因自民党问题损害自身形象与选情。

“两党缺乏牢固的政治互信，这种松散的合作架构将为日本政坛增添多重不确定



11月1日，日本东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结束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行程，回国日本。 视觉中国供图

定性，甚至可能加剧政治格局的波动。”陈洋总结道。

延续“安倍路线”恐难适当下困局

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记者会上，高市早苗明确表示，日本的政治稳定依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政策与外交安保战略。此后她所提出的各项政策，也与其一贯的右翼鹰派立场高度一致。然而，有分析人士向日媒指出，若想借此凝聚自民党、重获公众信任，绝非易事。

据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在首次内阁

会议上下达的首项指令即是：迅速制定新经济政策，以应对持续高企的物价压力。陈洋分析认为，这一做法符合战后日本政治的某种规律：执政成败往往系于经济表现。例如，2008年至2009年麻生太郎就因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力而下台。

然而，高市早苗所倚重的“安倍路线”，核心之一是延续宽松货币政策。该政策在安倍执政时期曾有效提振股市、刺激旅游业，但未能惠及普通民众，反而为当前的通胀压力埋下隐患。“如今，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加剧，日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安倍时代已大不相同。”陈洋指出，“‘安倍路线’虽

成熟，却难以适配当下复杂现实。”

除经济挑战外，外交表现也将直接影响其内阁及自民党的支持率。因此，高市早苗一上任便密集展开外交活动：10月26日出席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10月27日至29日接待到访的特朗普；10月30日至31日赴韩国庆州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在日美首脑会谈中，特朗普曾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牢固程度，我们是最强有力的盟友”，并期待进一步强化同盟。高市早苗则回应称，日美同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同盟”，日本将与美国“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双方就经贸、安全等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确认深化同盟关系的方向。

陈洋观察到，高市早苗不仅与特朗普举行会谈，还成功与中国、韩国等邻国领导人开展双边对话。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其内阁支持率，也让日本民众对其新政府抱有初步期待。

“但这种支持能维持多久，仍取决于后续政策的实际成效，以及她能否真正回应民众关切、解决日本社会面临的现实难题。”陈洋强调。

日美同盟动向牵动亚太安全格局

“我知道你是安倍非常看好的政治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祝贺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时如是说。高市早苗随后向媒体透露，特朗普“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并转述称“安倍前首相非常看好你”。

日媒注意到，高市早苗以安倍晋三“政治接班人”自居，这一身份或有助于她

拉近与特朗普的关系。同时，高市早苗告诉特朗普，强化日美同盟是其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中之重，并强调日本在美国对华战略及“印太战略”中可发挥关键作用。当前，美国正寻求愿意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盟友，而高市早苗主张激进扩军、对华强硬，显然契合美方的地区战略诉求。

然而，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早苗的厉史修正主义立场、日本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以及潜在的日美贸易摩擦，可能从战略互信、政策协调与地区稳定等多个层面，为日美关系带来新挑战。

陈洋指出，安倍执政时期日美关系相对顺畅，一方面因其执政基础稳固，另一方面得益于他与特朗普的私人交情，许多分歧得以通过非正式渠道化解。“但高市早苗刚刚上任，尚难轻易获得美国的深度信任。”

在安保议题上，高市早苗向特朗普明确表达了推动日本防卫能力“根本性强化”、持续增加防卫预算的决心。这意味着她将延续并深化日美同盟，进一步推进“日美+”多边安全合作框架。

谈及这一趋势对亚太地缘政治的影响，陈洋认为，结合高市早苗的政治立场，区域安全不确定性或将加剧，亚太可能步入一个“同盟对抗升级、经济分化加深、政治平衡更脆弱”的新阶段。

他进一步分析指出：首先，高市早苗的厉史修正主义倾向会严重伤害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民众感情。若其任内再度在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参拜等问题上引发争议，将严重损害地区政治互信。

其次，日韩关系本就因历史遗留问题与领土争端而脆弱。若高市早苗为提振国内支持率发表涉韩消极言论，恐使双方在安全协调与经贸合作上取得的进展付诸东流。

关于中日关系，陈洋强调，日方应切实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将“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的表态落到实处。“中日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日方应坚持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避免让局部矛盾定义两国整体关系。”

□ 刘琛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已进入新的战略阶段。联合国秘书长2025年9月发布的报告《转变范式：以团结实现妥善应对》明确指出，2025年是全球发展的“十字路口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构建面向未来的全球治理新范式，已从必要之上升为迫切之需。

这一转型的首要任务，是确立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引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在推动进步的同时，也带来新的不平等。联合国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科技领域女性占比仅29%，担任领导职务者不足14%；约28%的女性岗位面临人工智能冲击，高于男性的21%。联合国妇女署在第50个国际妇女节发布的报告更警示：2024年，近四分之一国家出现妇女权利倒退。这提醒我们，技术进步若缺乏公平导向，反而可能加剧社会裂痕。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共促发展繁荣”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思路。习近平主席在亚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传递了共促发展繁荣的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强调应推动各国人民权益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同向并进。这一主张倡导通过顶层设计凝聚共识，在实践层面提出可操作策略，动态回应国际形势变化，最终构建兼具系统性、多样性与知识深度的全球治理新范式。

历史经验表明，共生共进方能致远。以农业为例，2025年10月31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其成立80周年之际，为新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集中授牌。中国新增6项，总数达25项，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不仅体现传统农耕技艺，更承载着“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追求人与自然更高层次的和谐。这种蕴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理念的文化资源，具有跨越国界的共情力，可为全球治理注入人文温度。

全球治理的转型，还需超越权力逻辑，回归公平与自然法则。正如“软实力”理论提出者约瑟夫·奈所言：“没有任何国家愿意被操控，即使是被软力量。”真正的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2025年APEC《庆州宣言》首次将“文化创意产业”列为亚太新增长动力，并决定将其提升为独立合作议题，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宣言强调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文化与旅游、经济深度融合，彰显了文明互鉴对区域合作的战略价值。

城市，正成为这一进程的重要载体。在2025年世界城市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新增58座“创意城市”，中国泉州（美食之都）、无锡（音乐之都）入选。至此，中国已有20座城市加入该网络，涵盖美食、音乐、设计、文学等八大领域。这些城市凭借文化创意力与创新规划，不仅讲好本土故事，更积极参与全球对话，成为推动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前沿阵地。

综上所述，全球治理遭遇逆流，但积极力量仍在推动变革。APEC将文化产业纳入核心议程、联合国强化农业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多国重申性别平等承诺……这些举措虽分散，却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全球治理必须更具包容性、人文性和可持续性。

面向未来，新范式的构建应更多吸纳全球南方国家的智慧，尤其是中国在生态文明、文化传承与发展协调等方面实践的探索。以“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的胸怀，回归全球治理的初心——促进经济增长、增进人民福祉，在开放中共享机遇，在合作中共谋共赢。

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在百年变局的激流中，锚定航向，驶向属于全人类的美好未来。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从抗通胀到护债务：美联储何以按下“缩表暂停键”

□ 薛子敬

在10月的议息会议结束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宣布，自12月1日起将停止主动缩减资产负债表（缩表），即暂停量化紧缩操作，并下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使基础利率维持在3.75%至4.00%区间。所谓“缩表”，是指美联储通过不再对到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进行再投资，逐步收紧银行体系流动性，实现资产负债表正常化。本轮缩表始于2022年6月，当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接近9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30%。此次宣布暂停缩表，被市场普遍视为美国货币政策立场趋于缓和的信号。一方面，市场对流动性进一步收紧的担忧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由于降息路径仍不明确，投资者对通胀反弹和政策滞后风险保持警惕，市场呈现多空交织的复杂反应。

高债务约束下的货币政策困境

作为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理论上以促进最大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为双重目标，应保持政策独立性。然而，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38万亿美元，净利息支出接近或逼近国防支出规模，成为仅次于社保的主要支出项目之一。

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日益受到财政可持续性的制约。若继续加息或缩表，固然有助于控制通胀，但将显著推高政府融资成本，加剧系统性债务风险。若转向降息或扩表，则可能刺激通胀回升或助长资产泡沫，背离价格稳定目标。

回顾近年政策轨迹，新冠疫情后，美联储迅速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接近零利率水平，并启动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资产负债表在18个月内扩张近4万亿美元。随着通胀在2021年下半年显著攀升，美联储于2022年3月启动加息周期，并于同年6月同步开启缩表。在17个月内累计加息525个基点后，通胀有所回落，但财政压力持续上升。今年以来，白宫多次公开呼吁美联储尽快降息，强调高利率正在加重政府债务负担。此次暂停缩表，表面理由是防范市场流动性紧张，实则反映出美联储在财政压力与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艰难权衡。其政策重心正从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逐步转向维护债务体系的稳定运行。

美国利率周期的全球化外溢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的每一次重大调整，都会对全球金融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在加息缩表阶段，美元升值走强、资本回流美国，新兴市场普遍面临资本外流、本币贬值和以美元为主的外债偿付压力上升的三重挑战。在上一轮美国加息与缩表周期

期间，全球融资环境急剧收紧，新兴市场普遍承压。斯里兰卡因外汇枯竭，偿债能力恶化而宣布主权债务违约；埃及则在外汇紧张与进口成本飙升背景下，被迫接受更苛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反映了强美元周期下脆弱经济体所面临的流动性挤压。

反之，若美联储转向降息扩表，全球美元融资成本下降导致的全球流动性泛滥，又可能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和新兴市场资产估值，埋下金融泡沫隐患。美联储于2022年3月启动加息周期，并于同年6月同步开启缩表。在17个月内累计加息525个基点后，通胀有所回落，但财政压力持续上升。今年以来，白宫多次公开呼吁美联储尽快降息，强调高利率正在加重政府债务负担。此次暂停缩表，表面理由是防范市场流动性紧张，实则反映出美联储在财政压力与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艰难权衡。其政策重心正从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逐步转向维护债务体系的稳定运行。

结构性矛盾制约美联储政策空间：美国产业空心化

当前美国货币政策的两难处境，本质上是美国内部长期结构性问题的集中体现。过去数十年，美国在全球分工中过度追求资本回报优先，推动制造业大规模外迁，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

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财政收入基础薄弱，只能依赖举债维持高消费与高福利模式。国际货币体系长期依赖美元计价和美债作为核心安全资产，但这一机制正因美国频繁使用金融制裁、债务不可持续以及“去全球化”思潮而遭遇信任挑战。

2025年伊始，“美国优先”政策强力推动贸易保护与供应链重组，加速了全球对美元体系的反思。近年来，去全球化、贸易壁垒及金融制裁工具化，使部分经济体探索本币结算、增持黄金、调整美债仓位。美元体系并未被颠覆，但边际上的分散化趋势增强。在此背景下，美国财政扩张需求与货币政策目标形成深度绑定：政府需要低利率以维系债务运转，而美联储若过度宽松，又可能导致美元信用受损、加剧全球通胀风险。因此，美联储政策空间明显压缩，独立性面临更强的现实约束。

如今，美联储的政策选择已不再单纯基于统计层面围绕本国就业率与控制通胀展开，而是更多服务于债务体系的稳定运行。无论加息还是降息，都难以摆脱“债务陷阱”与政策独立性的博弈困局。理论层面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工具，正日益异化为政府债务管理工具，这既是美国宏观治理能力退化的体现，也是全球货币体系深层矛盾的缩影。未来，若结构性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美联储恐将持续在财政压力与政策目标之间艰难平衡，其作为独立央行的权威与效能，也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以制度型开放促青年合作 以全球治理力塑未来发展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子露
记者 王梓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系统部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亦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列为重要方向。在此背景下，2025年10月27日至31日，第二届青年企业家国际合作发展大会在浙江安吉成功举办。

来自近40个国家的260余位商界领袖、青年创业者及国际组织代表齐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围绕“共享新机遇、共谋新发展”展开深度对话，以实际行动响应党和国家关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战略部署。这场以青年为主角的国际论坛，不仅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绿色科技等前沿领域的创新成果，更彰显了全球青年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重塑国际合作格局中的关键作用。

制度型开放：搭建全球青年合作新平台

“中国正在构建一个强大的全球合作网络——不仅在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也延伸至更广泛的国际社会。”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法布里奇奥·霍克希尔德在大会期间表示，“这种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技术转移能力上，更体现在凝聚多元力量、促成跨界协作的平台作用。”

这正是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生动实践。尼日利亚青年企业家塞缪尔·恩杜布伊尔斯-布朗坦言：“正是这样的青年对话平台，让我有机会来到中国，这里汇聚了丰富的知识交流机会，不仅帮助我们学习先进经验，更为我们在非洲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与连接。”在他看来，中国通过机制化、常态化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



青年提供了参与全球创新体系的“制度接口”。

俄罗斯亚洲企业家协会青年交流与教育项目委员会主任雅希纳·维克托罗芙娜·埃琳娜强调：“关键在于搭建桥梁、构建平台，弥合因发展不平等造成的鸿沟。”她表示，中俄青年正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深入融入彼此的文化与未来发展规划。

值得一提的是，大会期间正式发布的《国际青年企业家创新合作（安吉）宣言》，正是制度型开放理念的具象化成果。该宣言由国际青年企业家协会联盟推动，旨在为全球青年创业与合作提供制度性支持与行动框架，标志着青年合作从“项目对接”迈向“规则共建”。

青年人才战略：让创新力量成为可持续发展引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总干事办公室青年官员奥拉多·奥拉乌米直言：“中国在

凝聚全球青年力量方面正发挥引领作用。”她指出，新兴科技公司CEO的平均年龄约为35岁，青年领袖在全球创新中举足轻重，但他们却常被排除在关乎数字未来的关键决策之外。“正因如此，全球青年齐聚安吉，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可持续发展，才显得尤为关键——这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包容、际遇对话与文化互鉴。”她表示：“我很感谢能有这样一个平台。”

在“人工智能新机遇”平行论坛上，尼日利亚青年企业家、布朗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塞缪尔·恩杜布伊尔斯-布朗分享了一个真实案例：一位拉各斯的出租车司机，通过一款本地开发的AI应用，仅用两天便凭借移动支付和通话记录获得人生首笔银行贷款。“在尼日利亚，我们正用AI为全球30亿缺乏信用记录的人打开金融包容的大门。”他说。

<p